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2年9月1日（第267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美外交政策已陷入“中国陷阱”

美国的决策依据应专注于实现自身的理想和愿景，而非与中国比较。与其怀念过去的卓越地位，美国应带头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经过改革的国际体系以应对共同挑战。

中美关系

美前外交官呼吁中美在非洲展开卫生合作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 8 月 21 日登载美国前驻赞比亚大使马克·C·斯特雷拉（Mark C. Storella）等合著的文章，呼吁中美支持非洲公共卫生系统，特别是非洲联盟（AU）旨在发展非洲药品管理局（AMA）的项目。以下是文章摘要：

中美两国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非洲国家改善本国公共卫生系统。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成功遏制了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中国提出要建设“健康丝绸之路”，该项目已经在非洲建立了多所医院，近两年还向非洲国家提供疫苗和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材料。美国在建立现设在埃塞俄比亚的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国则为该机构提供了总部大楼。

中美能够提供不同但互补的战略来支持非洲卫生系统，美国强调技术支持，中国则提供卫生基础设施和商品。美国可以邀请中国加入其支持非洲药品管理局的努力。中美可以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其国内疫苗生产能力，一旦疫情再次来袭，这些国家能参与全球卫生解决方案。两国还可以在下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共同发起一项决议，呼吁其他国家参与进来。

人工智能成为中美竞争新前沿

美国《外交家》杂志（The Diplomat）网站 8 月 15 日登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博顿（James Borton）的文章称，人工智能有望革新交通和能源等部

门。中国已经准备好在其基础设施计划中利用这些潜力巨大的创新，华盛顿也不能落后。

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到 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中国经济增加约 6000 亿美元，其中 3350 亿美元来自自动驾驶。中国也在促进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在提高性能、确保安全的同时，降低成本。美国也没有坐以待毙。在铁路网络方面，美国 Remark Holdings 公司与佛罗里达铁路运输公司光明线（Brightline）合作开发能够感知并预防铁路入侵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能源领域，美能源部已经成立人工智能高级委员会，负责协调美国在该领域的努力。美国的私营部门也越来越多加入进来。

过去一年来，中美两国都公布了历史性的基础设施投资方案。中国仅在 2022 年就计划投入 2.3 万亿美元用于基建，是华盛顿计划未来五年投入的 1.1 万亿美元的两倍多。此外，中国瞄准的是更加先进的领域，而美国超过一半的资金是用于维护现有项目，用于投资尖端技术的资金很有限。美国在追赶中国而非创新，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是如此。如果美国希望超越中国，那美国未来必须投资创新，而不是追赶中国。

CSIS：美新气候法案旨在与中国竞争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 8 月 25 日登载该中心中国商业和经济项目研究员伊拉里亚·马佐科（Ilaria Mazzocco）的文章称，尽管供应链多元化势在必行，但要与中国完全“脱钩”并不理性，也不切实际。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近期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IRA），法案包含诸多条款，包括医疗保健和企业税，但其促进“脱碳”和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措施使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具雄心的气候法案。

虽然法案对于美国气候倡导者而言是一个胜利，但法案的大部分内容仍在强调与中国竞争。由于在清洁能源技术供应链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一直被视为清洁能源转型的最大受益者。为了避免美国的“脱碳”努力令中国受益，法案中添加了产业政策条款，旨在提高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然而，取代中国所需的时间恐怕要以几十年来衡量。

法案规定在未来 10 年将投资 3690 亿美元以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其中，为美国的太阳能组件、风力涡轮机、逆变器、电池制造和关键矿物加工提供 300 亿美元的生产税收抵免。此外，法案将授权美国能源部 200 亿美元的贷款额度，用于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制造。这项法案还包括广泛的经济激励措施以支持零排放发电和提高能源效益。据估计，法案会将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从目前的 40% 提升至 2030 年的 60-81%，这意味着对清洁技术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需求会增加，进而刺激国内生产。

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从直接补贴到贷款担保到低成本的土地特许权或税收减免，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到吸引外国投资的措施，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令其在清洁能源技术竞争中拔得头筹。

美国的确应该加强国内制造实现供应链多样化，但必须认识到，要实现制造业的完全回流并不现实。美国目前仍需要依赖他国的生产。尽管供应链多元化势在必行，但应基于现实考量，美国短期内很难避开中国供应链。

东南亚国家日益青睐非美元支付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技术和国际事务项目非常驻学者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的文章

称，美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东南亚对非美元金融渠道和人民币结算的日益青睐。文章摘要如下：

今年 6 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启动“人民币流动性安排”（RMBLA），旨在通过构建储备资金池，在金融市场波动时为参与该安排的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五个参与该安排的央行有三个位于东南亚，分别为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此外，泰国、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政策制定者也宣布将采取措施限制美元的使用。在此背景下，北京积极推动跨境人民币金融渠道，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以为东南亚企业提供美元的替代选择。

一直以来，东南亚严重依赖美元。近年来，东南亚新兴市场 80% 以上的未偿国际债务证券和域内跨境贸易支付都是以美元计价。此外，美元因其流动性与稳定性在东南亚外汇市场举足轻重。东南亚官员寻求限制该地区对美元金融渠道的依赖，主要出于三个原因。

一是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收紧，东南亚的政策制定者们认为，限制他们国家对美元的高度依赖，有助于减少其经济抵御冲击的脆弱性。二是美元主导地位的另一面是金融制裁的威慑力，这令东南亚国家有所警惕。三是为避免大额跨境支付的高昂中介成本，东南亚国家正在寻求区域内解决方案。尽管各国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数据表明，东南亚国家正缓慢而稳步地去美元化。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东南亚的央行行长们会如何应对持续的当地货币贬值问题，以及美国收缩的货币政策。美国决策者应采取措施消除东南亚对美元的顾虑。首先，以符合美国利益与特定国家关切的方式发展本币结算协议（LCS）。例如日本、泰国在该地区跨境贸易中所占份额较高，它们支持本币结算但未必支持人民币结算。其次，关注新技术以及东南亚应

对目前金融渠道操作限制的政策可能对美国利益产生的影响。例如，东南亚五个最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央行正在研究或实验央行数字货币，华盛顿和该地区的盟友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北京可能会对该地区央行数字货币标准施加的影响。最后，继续注重创新，以提高大额跨境美元结算渠道的国际吸引力。

美学者：美外交政策已陷入“中国陷阱”

美国的决策依据应专注于实现自身的理想和愿景，而非与中国比较。与其怀念过去的卓越地位，美国应带头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经过改革的国际体系以应对共同挑战。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网站登载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杰西卡·陈·韦斯（Jessica Chen Weiss）的文章称，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陷入与中国零和博弈的危险逻辑，对遏制中国的执着恐将危及美国自身。文章摘要如下：

与中国的竞争正在侵蚀美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一个利益与价值观与自身均不同的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美国的政治家和决策者越来越专注于寻求对抗，甚至开始忽视原本支撑美国战略的积极利益和价值观。尽管美国有诸多理由针对中国，但这种警惕很容易演变为一种反射性恐惧，最终殃及美国自身。

美国的决策依据应专注于实现自身的理想和愿景，而非与中国比较。与其怀念过去的卓越地位，美国应带头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经过改革的国际体系以应对共同挑战。一个包容的国际体系既能约束竞争，又能明确竞争成本。零和逻辑只会造成恶性循环，两败俱伤。

在美国看来,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在中国,中国不再总是“韬光养晦”,而是对内对外均变得更加自信。对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行动,从关税制裁到限制商业和科学交流。美国不仅背离了开放和非歧视性原则,也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的信念,即美国及其盟友不会容忍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过去五十年,美国对华策略是“接触+威慑”,将中国纳入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但美国却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恶意揣测。随着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大陆,北京捍卫主权的意志愈发坚定。即便危机能够避免,目前的地缘政治分歧也将持续。美国仍会拉拢盟友对抗中国,但并非所有国家都会与之保持一致。美国的做法不仅可能迫使中俄接近,还会导致中美双方在气候问题、经济治理、商业与科技交流等领域难以达成合作。

迄今为止,拜登政府的全球秩序建设仍集中在排除中国的安排上,例如“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尽管仍有如WTO等包容性较强的组织能够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但若美国对联盟的投资仍优先于更广泛性的全球协议或机构,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将破坏而非重振国际体系,并侵蚀全球治理基础。

为了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解决国际社会对美国在履行现有国际秩序上奉行“双重标准”的批评,美国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明确承认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例如入侵伊拉克。第二,华盛顿必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实际价值,无论是在新冠疫情、气候、饥荒还是技术方面,而非简单地敦促他们不要与中国合作。在国内,华盛顿需努力重建两党对美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支持。第三,以美国自身的方式实现政策目标,而非源于对中国条件反射性的反对。第四,发挥榜样力量,确保对中国的反制不会成为消耗自身实力与声誉的陷阱。

美国外交

美国在阿富汗留下了失败的遗产

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网站近期登载其高级研究员布雷特·谢弗（Brett D. Schaefer）的文章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一场灾难，给阿富汗留下了失败的遗产。

文章称，一年前拜登政府曾保证美国的撤军安全有序且阿政府军有能力阻止塔利班卷土重来，但事实证明撤军是一场灾难。塔利班几乎立即接管了政权，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沦为人道主义和人权的重灾区。经济崩溃，民生凋敝，近期的地震和干旱更进一步加剧了阿富汗人民的痛苦。

虽然联合国和慈善组织呼吁外国政府解除制裁并对阿富汗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但情况并未明显好转。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大约三分之二的阿富汗民众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但在塔利班管控下，救助格外困难。

在一定程度上，塔利班是在利用阿富汗人民的苦难“敲诈”国际社会。尽管知道个中风险，但拜登政府对塔利班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绥靖政策。去年八月以来，美国已向阿富汗提供了近8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并放松了对其金融交易的限制。尽管主观意图是援助阿富汗人民，但客观结果是“奖励”塔利班侵犯人权的行为。尽管美国坚称，现在承认塔利班的合法性为时过早，但事情发展的轨迹是明确的，旨在追究塔利班责任的惩罚措施最终将被缓慢侵蚀。

美学者建言美日在卫生领域加强合作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8 月 25 日登载美国全球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之友组织首席政策官马克·勒冈 (Mark P. Lagon) 和日本国际交流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姆斯·甘农 (James Gannon) 合著的文章, 建议美日两国在全球卫生领域展开更多合作。

文章称, 在当今世界, 美国与盟友加强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没有日本的合作, 美国很难对抗大陆“孤立”台湾的行动, 无法统一战线支持乌克兰, 也无法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挑战。双方可通过双边合作, 或作为“四方安全对话”或“七国集团”等“小多边”倡议的核心来发挥影响力。

美日伙伴关系可以将全球卫生作为焦点和起点, 进一步加强合作。对两国而言, 一项战略性的全球卫生议程应聚焦三个领域:

首先, 在即将举行的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的增资会议上展现联合领导力。拜登已要求国会拨款, 将美国对该基金的三年资助承诺增加近 30%;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可以增加对该基金的资助, 以向拜登表明其与美国合作的决心和姿态。

其次, 新冠肺炎疫情表明, 有必要做出努力更好地预防和应对新的流行病。在这方面, 美日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确保大流行防范工作协调、有效和公平。此外, 美日拥有各自的生物医学优势, 实现“七国集团”国家承诺的在发现新的大流行威胁后 100 天内建立大流行防范能力的目标。

最后, 日本在全民健康覆盖 (UHC) 方面的领导力符合当前形势, 美国可以效仿。两国可以协调双边资金以推进全民健康覆盖, 共同支持扩大卫生系统, 加强医疗保健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新战略的潜力和局限性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8 月 17 日登载该机构非洲项目主任兼高级研究员曼巴·菲佐·迪佐拉(Mvemba Phezo Dizolele)等人的文章称,美国近期启动了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战略,这将成为指导美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牢固伙伴关系的第一步。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目前对非洲的态度存在“表述不清”和“家长式作风”问题,这使美国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非洲领导人变得愈发强硬时难以自处。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战略确定了美国参与非洲的四大战略目标:一是促进公平和开放的社会;二是推进民主努力并应对安全挑战;三是支持疫情后的强劲复苏;四是鼓励气候适应和绿色能源转型。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战略并不要求制定新的经济和发展倡议,相反,它强调改造和振兴现有的旗舰计划,使其行之有效。

美国多年来向其在非洲和欧洲的伙伴提供了大量安全援助,这种安全援助建立在军队对军队以及政府对政府模型的基础上,美国的新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这一现状。尽管该战略鼓励与当地安全参与者加强合作,但美国参与安全领域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美国利益而非促进非洲利益。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其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美国和西欧国家囤积疫苗,而非洲国家则在努力满足其民众的公共卫生需求。在全球抗疫运动中,非洲医学专家被忽视,非洲国家在向美国申请疫苗专利时被拒绝,这导致非洲各地民众对于疫苗运动极度不信任。未来,在此类突发事件中,应咨询非洲公共卫生从业人员以制定有效政策。

作为污染最少的大陆,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议程对非洲国家提出的要求显然过高。非洲国家被强制要求采取绿色能源议程并

停止其天然气和化石燃料投资项目。在新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应带头与非洲国家接洽，基于非洲的现实情况，将财政承诺转化为真正能够支持绿色经济倡议的资金。

美进步派外交政策面临危机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 8 月 24 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国治国计划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的文章称，进步派应调整其外交政策，以适应大国竞争时代。

文章称，一年前，进步派的外交政策似乎势头高涨。但过去一年暴露了进步派外交政策的不足，如果进步派现在不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将不断恶化。随着美国陷入与中俄的激烈竞争，进步派不能再将大国竞争视为次要问题。他们必须决定自己的立场。

三种进步派立场

自冷战以来，美国进步派从三种有所重叠但截然不同的立场处理外交政策。第一种立场寻求促进民主和人权，反对威权主义和暴行，这也是美国决策中最具代表性的立场。秉持该观点的进步派认为，美国应该推动普世价值观和标准。但他们担心美国可能违反国际准则，煽动压迫，以牺牲工人阶层为代价使精英获利。

第二种立场强调基于全球治理的全球合作，认为美国和世界的首要任务是应对跨国和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流行病和不扩散。他们重视广泛的国际参与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反对将世界划分为敌对阵营。

第三种立场以政治军事克制为目标。进步国际主义者（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ist）和合作者（cooperator）希望按照他们的喜好来塑造国际秩序，克制者则对实现该目标是否

是最重要的，或是否能通过军事优势实现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美国在全球扮演的军事角色脱离了美国的利益，并形成恶性循环，不断造成亟需美国解决的问题。

这三种立场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占据全球主导地位时形成的。美国的单极优势使进步派能够混合这三种立场的因素，而不造成太多冲突。然而，如今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给进步派带来了艰难的选择。在最坏情况下，国际主义者和克制者可能会分道扬镳，前者支持与中俄进行长期安全竞争，后者则反对这种竞争。同时，由于全球分歧不断加深，合作者的数量可能不断缩减。左派的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整合进步派的三种立场，并设定优先级。

有限制的国际主义

在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崛起的世界中，进步国际主义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民主国家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为其人民提供服务。几十年来，进步派一直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军费开支，以便为国内的社会福利提供资金。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同时为亚洲和欧洲的盟国和伙伴提供国防保障，将增加美国的军事负担。进步派还认为，美国应该停止与亚洲、欧洲和中东的非自由和滥用权利的政权合作，但面对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美国决策者又不愿放弃这些联盟。

克制仍然至关重要

由于上述原因，克制作为进步派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仍具有价值。美国公众和他们在国会的代表们不会轻易同意一场可能导致大规模伤亡或经济衰退的战争。由于习惯于应对来自小国和恐怖组织的小威胁，美国政治体系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种现实。

为了获得成功，习惯高喊价值观的进步派不应回避谈论国家利益。随着美国与中俄展开竞争，美国人面临更高的风险和成本，

进步派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过度扩张会伤害人民的利益，以及为什么有原则的、克制的做法更能保障美国的安全和利益。

美国政治/其他

美国的劳动力正在流失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近期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兰（Michael Strain）的文章称，尽管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劳动参与率仍低于疫情前水平，这是需要引起两党共同关注的长期问题。文章摘要如下：

在过去六个月中，美国劳动力市场蓬勃发展，平均每月净增 46 万个工作岗位。截至 7 月，美国失业率降至 3.5%，与 2020 年初持平。从这两个数据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似乎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劳动参与率所展示的结果却与之相反。美国当前劳动参与率为 62.1%，比 2020 年 2 月（即疫情在美国全面爆发前一个月）低 1.3%。

美国劳动参与率衰减的根源在于年长者。提前退休和人口老龄化使 55 岁以上人群的劳动参与率降至 38.7%，比疫情前低 1.6 个百分点。据专家估计，人口老龄化会使劳动参与率继续降低。除去人口结构因素，与疫情前相比，20 岁左右青年群体的工作意愿降低了 3%，处于“黄金工作年龄”群体（25-54 岁）的劳动力参与率较 2020 年降低了 0.7%。

美国国内经济正持续增长，工资也水涨船高，然而劳动参与率却不断下降。矛盾现象的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1）疫情直接导致劳动参与减少；2）疫情早期通过的刺激经济法案为美国家

庭带来了超额储蓄，降低了人们的劳动意愿；3）由于托儿中心严格的防疫规定，部分父母因为要照顾居家的幼儿而无法工作。

失业率的上升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失业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还会导致更高的犯罪率和其他社会问题。而劳动参与率降低则更像缓慢的低烧，扭转这一趋势应该成为两党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

11 月中期选举是特朗普成败的关键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网站 8 月 18 日登载其高级研究员约翰·胡达克（John Hudak）的评论文章称，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采取了极具冒险性的支持策略，中期选举结果最终可能会决定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政治地位。文章摘要如下：

今年 11 月，特朗普将面临生存考验。初选期间，特朗普通过支持美国各地的候选人来展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中期选举将成为对其实力的真正考验，其结果将决定他未来在共和党内的实力。特朗普的支持策略无疑是大胆的，他将自己的声誉置于中期选举的风险之中，这一举动前所未有的。尽管政治家或官员都喜欢吹嘘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输赢记录，但赢得初选只是成功了一半，特朗普面临着更大的战斗。

特朗普的支持策略面临着来自民主党的外部风险。随着现任民主党总统以低支持率进入了中选周期，共和党人在各级政府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似乎已经成熟。但是，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民主党一连串立法胜利、美国国内通胀放缓等因素都增加了民主党的翻盘机会。如果民主党设法保住众议院多数席位，或者如果特朗普支持的几名候选人败北，共和党的潜在多数席位减少，特朗普将再次受到打击。

特朗普同样面临着激烈的党内竞争。如果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在中期选举中失利，2024 年大选的其他共和党潜在候选人必然会对特朗普发起激烈攻击，并伺机将这位前总统描绘成软弱、政治上无能的人。虽然成群结队的共和党民众将继续臣服于特朗普，但其他人则会怀疑他是否真的是共和党的未来。

拜登政府取消学生债务治标不治本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8 月 25 日登载其高级研究员安德烈·佩里（Andre Perry）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取消学生债务的计划有实际价值，但并不能解决借款人面临的根本困难。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政府近日终于宣布了备受关注的取消学生债务行动的细节。该计划将取消由美国教育部持有的“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获得者至多 2 万美元的学生债务，以及非佩尔助学金获得者最高 1 万美元的学生债务。债务取消适用于收入低于 12.5 万美元（或已婚夫妇收入低于 25 万美元）的人。

该计划确实采取了一些令人钦佩的措施来减轻毕业生的沉重负担。例如，拜登计划将借款人必须支付的金额从收入的 10% 降低到 5%，并免除 10 年后的贷款余额。此外，该计划还重申了美教育部之前宣布的“公共服务贷款减免”（PSLF），即免除曾在非营利组织、军队、联邦、州、部落或地方政府服务至少 10 年的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的债务。

新的债务取消政策也适用于持有 Parent PLUS 贷款的借款人，这是直接发放给父母的联邦学生贷款。据统计，大约 370 万户家庭为其子女的本科教育欠下 1040 亿美元。平均而言，55% 的贷款在 10 年后依未还清，对于黑人家庭而言，这一比例高达

96%。因此，新政策将有利于黑人学生比例较高的家庭和高等教育机构。

当然，拜登政府的计划也有缺点。首先，计划设置了 12.5 万美元的收入限制。批评者认为制定取消债务计划时，不应基于收入而应考虑财富（一个人的资产减去其债务）。否则并不利于缩小反映在违约和偿还率上的种族差异。此外，该计划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它没有解决已经成为常态的高等教育机构学费大规模上涨的问题（高等教育体系的学费在过去 30 年里上涨了三倍）。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人们不需要贷款上公立小学和高中，大学教育也应如此。各州立法机构大多控制了公共机构的学费，故而可以进行补贴，目前公立两年制高等教育课程已经接近于免费，但美国家庭仍需要一个四年制高等教育的普遍公共选择。

特朗普面临“四项主要刑事和民事调查”

近期，美国沃克斯新闻评论网（Vox）高级记者尹恩·米尔西瑟（Ian Millhiser）从多方渠道对“海湖庄园”事件的后续情况进行了跟踪，并于 Vox 官网发表评论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虽然联邦调查局（FBI）并未公开所查获文件的内容，但据联邦法院最新公布的搜查令附件显示，FBI 认为特朗普可能违反三项联邦刑事法规，这三项法规涉及销毁、隐藏或错误处理某些政府机密文件。违反《间谍法》相关条款最高可判处 10 年监禁。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因涉嫌窃取这些文件而面临刑事指控。

第二项联邦调查正围绕“1·6 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展开。去年 1 月，美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曾公开表示调查“1·6 冲击国会大厦事件”是司法部的优先事项，

将全力追究所有参与暴乱事件人员的法律责任。尽管司法部不太可能在最终起诉特朗普之前披露太多信息，但国会和司法官员都表示，特朗普在 2020 年选举问题上涉嫌违反至少两项联邦刑事法规。

第三项调查位于佐治亚州，州检察官将就特朗普团队干预该州 2020 年大选问题对其展开刑事调查。在调查结束之前，特朗普可能受到牵连，甚至受到刑事指控。富尔顿县 (Fulton County) 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 (Fani Willis) 获准成立高级特设陪审团调查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寻求改变选举结果”的行为。特朗普竞选团队试图虚构选举人团名单，以捏造该州的选举结果欺骗国会。涉嫌犯罪的 16 名虚假选民是调查的主要目标，存在被刑事指控的风险。调查涉及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顾问鲁迪·朱利安尼以及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当然，即便朱利安尼或格雷厄姆最终被指控或被定罪，这是否会牵连到特朗普尚未可知。

第四项调查涉及金融方面的指控，分为两项独立调查，分别由纽约州与曼哈顿检察院主导进行。纽约州检方指控特朗普集团涉嫌金融欺诈。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 (Letitia James) 花了三年时间调查特朗普集团是否存在为获取银行贷款或者避税，向贷款机构和税务部门提供虚假财报的行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 (Alvin Bragg) 进行的刑事调查与詹乐霞进行的民事调查内容大致相同，但其在指控特朗普问题上十分谨慎。

刑事调查以及最终起诉的目的，是为了在全面的刑事审判后说服陪审团对被告进行定罪，而非定期向媒体或公众更新调查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在联邦调查背景下，这些规范的存在既是为了保护调查本身，也是为了保护潜在嫌疑人。出于上述原因，任何急切渴望看到特朗普调查结果的人都必须有耐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朗普的命运将笼罩着不确定的阴云。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